

批判、误读与对话：关于波普尔历史哲学的思考 ——读《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有感

胡扬威

（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广东省江门市，529199；hywei1218@163.com）

摘要：本文围绕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思想，结合何兆武在《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相关评述，探讨其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与接受过程。文章从何兆武对波普尔的批评出发，分析了其评价背后的政治与学术背景，指出早期研究受限于时代环境，多倾向于政治批判而非学理分析。同时，本文还辨析了“历史主义”与“历史决定论”在译介与理解上的分歧，反映出历史学界与哲学界在术语使用与理论解读上的差异。作者呼吁跨学科对话与更开放的研究态度，以推动对波普尔思想的全面与深入理解。

关键词：波普尔；历史哲学；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

引言

卡尔·波普尔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但是，波普尔的思想中历史哲学部分，在中国学术界却经历了从误读、批判再到逐渐理性评价的曲折过程。本文以何兆武先生在《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对波普尔的评价为切入点，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环境的变化，尝试对波普尔历史哲学在中国的接受史进行梳理，对其中反映的学科鸿沟和话语差异进行反思。通过辨析“历史主义”与“历史决定论”的译名论断，进一步呼吁史学界和哲学界为推动对波普尔思想乃至西方史学理论的更全面理解、更深层次的跨学科交流。

1. 何兆武先生对波普尔的评价问题的思考

通读《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关于波普尔的相关章节（即本书第七章，第227-253页，本章由何兆武先生主笔），可以看出：何兆武先生对波普尔的评价不高。本书第223页有言：“自1939年起，希尔普（Paul A. Schilpp）开始编辑一套《当代哲学丛刊》，40多年来已陆续出版了20多种。1974年出版其中的第14种就是《波普尔的哲学》。这件一登龙门的事，似乎正式确定了波普尔在当代西方思想界的地位得以和杜威、怀德海、罗素等人并驾齐驱。从一个偏远国度里的一个默默无闻的讲师，一跃而侧身于当代最负盛名的哲学家的行列中间，而且还有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誉。当代西方思想家的得名之骤，波普尔要算是少数当中的一个；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波普尔大概也应该算是少数当中的一个[1]。”第245页又有言：“他既讨论各种各样的现代科学与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又纵情论列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思想方式——所有这些就为他的理论平添一道现代科学的色彩，显得与众不同，从而也给他本人烘染出一副特殊的神态。不走这种偏锋，他是不会享有他现在的名气的[1]。”此外，书中还有多处类似的评价。对于以上结论，我不知道何兆武先生是怎么得出来的，或者说不知道其是否经过深思熟虑。有着“有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誉”的波普尔成名的原因，果真就如何兆武先生所谓的剑走“偏锋”？就真的那么名不副实？

我们来看一下波普尔享有哪些名气：英国生物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梅多沃说：“我认为波普尔是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哲学家”；英国天文学家邦迪说：“科学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就是波普尔所说的”；法国分子生物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莫诺声称，波普尔对他的研究工作有过重要影响[6]。波普尔与罗素、卡尔纳普、哈耶克等这些国际著名思想家有过思想上的交流，并且与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等自然科学家有过密切往来，其思想受到他们高度赏识和赞扬[4]。波普尔能够和这么多当代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和思想家交往，并得到他们的赞扬和认可，名列“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我想也无可厚非；他的研究也确应有其过人之处，因为要是想得到一个人的赞扬是不难的，但是要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并非易事。

波普尔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自己独到的造诣。他在概率论上发展了概率的趋向性解释；在物理学上坚持实在论的观点，反对主观主义的解释；在生物学上提出了补充达尔文主义的假说；在科学方法论上发展了否定主义，提出了演绎检验法，表述了科学理论评价逻辑；在认识论上提出了知识成长理论、客观知识理论和逼真性理论；在社会政治理论上提出了反权威主义、社会渐进工程学和开放批判的主张；在历史哲学上提出了反对历史决定论等。

我们应当看到，波普尔在当代国际思想界能有这样的名气和地位并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很有个性、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都很强的人，他的著作和研究为人类思想宝库增添了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 [4]。包括历史哲学，波普尔的研究是有其不足和问题，对其错误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我们也不能一叶障目，只是对其不足进行批判，而不对其有价值的地方进行吸取和消化。甚至可以这么说，有时候对某一理论的借鉴是更为重要和有益的。

至于何兆武先生为什么对波普尔的评价不高，我认为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我国对波普尔的研究状况有关。中国对波普尔的理论（这里主要指的是他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是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一些学者们对文革时代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学者研究还是有所顾虑的。总体来说，当时的学术氛围还是不够宽松，不够自由的。另外，由于波普尔的历史哲学理论涉及批判马克思及其唯物史观，囿于中国的政治环境和限于研究倾向的惯性，所以初期研究多集中于政治批判上，全盘否定其历史观，简单粗暴地将其视为肤浅平庸之作，能从学理上进行深入分析的不多。虽然《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这本书最早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03年再版的。但书中波普尔的相关章节却是写在1987年以前。当时是为《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写的序言，后来才全文收录到《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这本书中。这样看来，对波普尔有这样的评价似乎变得可以理解了。在当时的环境下，有这样的评论是不足为怪的。进入新世纪以后，对波普尔历史哲学的研究已更加深入和更加合理，学者们在批驳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发掘其合理因素 [3]。

2. 是“历史主义”还是“历史决定论”——兼论历史学界与哲学界之间的沟壑

读了包括何兆武先生在内的历史学界学者关于波普尔的著作和文章，基本上都是把波普尔的名著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翻译为《历史主义的贫困》，把书中的 *historicism* 翻译为“历史主义”。究其源头，大概是198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何林、赵平译的《历史主义的贫困》。这是中国历史学界所翻译第一本波普尔论述 *historicism* 的著作。但是在同一年——即1987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波普尔的同一本书：*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中文译名却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翻译者是杜汝楫和邱仁宗，都为哲学界学者。前面已经讲过，中国对波普尔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后，但研究之初是以哲学界学者为主；直到何赵所译的《历史主义的贫困》出版之前，历史学界基本上是没有开始对波普尔进行研究的。可见正是在一开始，就将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译为《历史主义的贫困》，将 *historicism* 译为“历史主义”，从而影响的整个历史学界。

为什么这样翻译？这其中以何兆武先生的解释最有代表性。《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228页注释②解释道：“有人把波普尔的历史主义径直译作历史决定论。这种译法不能算错误，不过它在字面上就和 *historical determinism* 没有区别了，同时也不便于和波普尔所论述的其他各种‘主义’相对应 [5]。”这样说我想一般是不会有异议的，即何兆武先生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历史学界的看法，至少是主流看法。至于哲学界为何将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和 *historicism* 分别译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历史决定论”，笔者至今还为找到相关的解释。或者，这对哲学界来说根本就不是个值得解释的问题。

历史哲学是历史学和哲学的交叉学科，是两者共同的领域。虽然两者分别从历史学的角度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领域，有时候是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和看法，但是就这一领域内的基本内容和规范，学界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我想这有待于两学界的进一步沟通。另外，两学界也确实有必要进行沟通。既然研究的角度不同，有时会有不同的结论，为什么不就某一些共同的问题进行交流，以求得思想火花的碰撞，更好地推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其实，历史和每一个学科都有相关的交叉学科，比如和政治就有政治史的交叉，和经济就有经济史的交叉，如此等等。我认为，历史学可以以更宽广的胸怀来包容这些学科，历史学者则可以用更广博的视野来看待历史学，研究历史学，多和其他学界的学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多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吸收和运用，只有这样，历史学才会有大发展，才会有前途。这样说似乎不免有重复年鉴学派主张之嫌，但这确实是我自己的愚昧之见，我这里更侧重的是学界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再说，即使是在重复年鉴学派的主张，在当今中国学界的研究状况下，这样的主张是仍不过时，仍有其价值的。

3. 波普尔历史哲学的核心观点与当代启示

波普尔提出：历史并不存在必然的发展规律，人类无法通过科学方法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 [2]。他不赞同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所提出的试图将人类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偶然性纳入一个单一的、连贯的故事体系中，用以解释过去、理解现在并预测未来的宏大历史叙事理论，认为该理论不仅缺乏经验基础，还可能为极权主义提供理论支持。他主张以“零星社会工程”取代整体性社会改造，强调逐步、试错的社会改进方式。

波普尔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开放社会”是一种较理想的社会形态，自由批判、理性讨论、自我修正等被充分允许。知识通过不断否定与修正而得到进步，社会制度也应保持开放与可修正性 [2]。这一思想在当代中国对推动学术自由与社会创新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随着我国学术环境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波普尔的历史哲学逐渐从早期的政治批判对象向重要学理讨论资源转变。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其对社会工程、历史预测、知识成长等问题的论述，并在批判中汲取其理性精神与开放态度 [4]。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中国学界的成熟，也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思想对话的深化。

4. 结语

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在中国学界的接受过程，经历了由误读到批判，再到理性对话的过程，何兆武先生在《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对波普尔的评价，虽然受上世纪80年代政治和学术语境的限制而存在争议，但为我们认识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在中国的接受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历史主义”与“历史决定论”的争议，既体现了学科间的隔阂，也让我们认识到有必要进行跨学科的沟通。这也启发我们，今后对波普尔思想的学习要更加注重文字精读和脉络还原，在积极推进历史学、哲学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对话合作的同时，避免简单化的政治判断。

参考文献

- [1]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 [2]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 [3] 谭扬芳:《我国对波普尔历史哲学思想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 [4] 易杰雄:《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产生影响的原因探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1月
- [5] 何兆武:《评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1月
- [6] 马来平:《论哲学对科学的作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7.25